

专栏：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定量研究

专栏导语：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

——从宏观到微观

张书维*

古今中外，人口问题事关国本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人口的数量、质量、结构等核心要素都取决于整体的生育水平。因此，从生育环节入手，就切中了人口问题的要害。我国的生育政策，历经四十余年的执行与变迁，深刻影响了世界人口的走势及亿万家庭的命运。1980年，以“独生子女”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立，1982年，“提倡公民晚婚晚育、少生优生”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；至2011年各地全面实施“双独二孩”政策，两年后放开“单独二孩”，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束（李朔严、张克，2016）。再到2021年三孩政策正式出台，政策导向由过去的限制生育转向了鼓励生育，相关的配套措施也正在完善之中。政策调整为的是顺应时代变化。然而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：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.62人，比2010年减少了0.48人；继2020年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0‰之后，2021年再创历史新低^①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，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（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，2022）。

毋庸置疑，一国的生育政策是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安排，旨在塑造民众的生育观。从微观角度看，生育与否、生育几个、何时生育以及生男生女，涉及个体的生育决策和态度；其中的关键是生育意愿（即对生育数量的考虑），生育意愿决定生育行为（张书维等，2021），又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（吴帆，2020）。

* 张书维，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基金项目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（72273155、71873149）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（18CGL043）。

① 平均家庭户规模数据来源于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（第二号）》。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21》，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8.52‰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.52‰。

由严放宽的生育政策之下，怎样才能收获积极的生育意愿？这是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价值的重要问题，亦是一次观察宏观情境如何作用于微观个体的绝佳机会。本专栏的三篇文章，即寻此展开。

《政策设计、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——基于“独生子女”政策的反馈效应分析》一文，基于政策反馈理论，以中国1980—2013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研究对象，先通过31个省份的216份计划生育政策文件中的生育调节要求构建了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，再利用三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（CGSS2010/2012/2013）实证检验了政策设计对民众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（“期望子女数”）的影响。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证实了生育政策设计越严格，个体的政策认同程度越高，其偏好与政策要求也越一致。该文为我们指出了从生育政策到生育意愿的直接路径（含正向中介）：服从—认同—内化。

《当代中国年轻人低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及其政策意涵》一文，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和现代化进程共同建构的低生育文化，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（CSS）2019年数据，讨论父辈的生育率与子代的生育意愿（“理想子女数”）之间的关系，及受教育水平在其中的作用。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生育文化的代际传递仍然有效，但影响渐趋式微；原因部分缘于教育的稀释。该文为我们指出了从生育政策到生育意愿的间接路径（含负向中介）：文化—教育—习得。

上述两篇论文各有千秋，又存在两大异曲同工之妙。首先是研究逻辑，将宏观情境操作化，建立与微观个体变量的正相关，并揭示其中介机制；其次是研究方法，针对学界知名度和引用率较高的全国调查数据展开分析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结果的可信。

《助推生育意愿的默认选项效应研究：以“二孩”为支点》一文，则另辟蹊径，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，聚焦宏观情境下生育意愿的行为助推策略，通过两个调查实验探索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（“假设子女数”）的因果机制及其边界条件（内部的卷入度和外部的描述性规范）。该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不改变结构性因素的同时，创造了提升生育意愿的另一种可能——巧用默认选项的干预工具，挑选重点人群，营造政策氛围。张书维等人（2021）的前期研究已经发现，信息框架效应（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）能够助推生育意愿。可见，行为公共政策的精微之术在生育研究领域依然行之有效、大有可为。

三篇论文不约而同地使用定量手段，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囊括了几种主流方式。合起来，以一手或二手数据诠释了新近提出的“政策过程的行为模型”——试图让微观层面的个体认知及行为嵌入宏观层面的政策、制度、文化、

经济情境中去，并形成循环（Ewert et al.，2021）。站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几位作者的努力已经超越了生育研究本身，彰显出更大的学术抱负和入世情怀：突破宏观与微观的壁垒，缩小理论与现实的距离。就此引出本专栏的实践启示，简言之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，政府应承担起主体责任：一方面制定更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（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贴、时间投入、育儿－工作平衡、托育服务、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），锚定“不敢生”群体；另一方面，创造更简捷的助生环境，构建更正面的生育文化，瞄准“不想生”群体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、长期性、战略性问题。在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实施一周年之际，2022年8月16日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国家卫健委、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人口发〔2022〕26号），全方位一体化地推动我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。综上，扭转低生育率的不利局面，迫在眉睫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任重道远。因此，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，多多益善。

参考文献

- 李朔严、张克（2016）.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研究（1956—2015）——基于间断均衡模型的视角. *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*, 5(4): 32–42.
- Li, S. Y., & Zhang, K. (2016). A Case Study of the One-Child Policy Change in China (1956–2015): A Punctuated-Equilibrium Perspective. *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*, 5(4): 32–42. (in Chinese)
- 吴帆（2020）. 生育意愿研究：理论与实证. *社会学研究*, 4: 218–240+246.
- Wu, F. (2020). Review on Fertility Intentions: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. *Sociological Studies*, 4: 218–240+246. (in Chinese)
- 张书维、谭小慧、梁歆佚、朱亚鹏（2021）. “助推”生育政策：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. *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*, 10(1): 42–54.
- Zhang, S. W., Tan, X. H., Liang, X. Y., & Zhu, Y. P. (2021). Nudging Fertility Policy: Two Survey Experiments of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Framework on Fertility Intention. *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*, 10(1): 42–54. (in Chinese)
-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（2022）. 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. *求是*, 15: 46–51.
- Leading Party Group of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. (2022). Write a New Chapter in Population Work under the New Era. *QIUSHI*, 15: 46–51. (in Chinese)
- Ewert, B., Loer, K., & Thomann, E. (2021). Beyond Nudge: Advancing the State-of-the-art of 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. *Policy & Politics*, 49(1): 3–23.